

● 李静 廖心文 编

周恩来交友录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周恩来交友录

疾风知劲草 患难见真情

周恩来与瞿秋白

瞿秋白（1899—1935年），1919年五四运动时参与领导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1927年主持召开八七会议。会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1930年主持召开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打击。此后，在上海同鲁迅合作从事革命文化运动。1934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6月就义。主要著作收入《瞿秋白选集》和《瞿秋白文集》。

——编者

瞿秋白与周恩来，同是江浙人，都是由破落“仕宦之家”的逆子贰臣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与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创时期和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他俩建立起了政治目标一致、革命策略相通、自觉舍己为人民的高尚友谊，一直被人们赞颂，传为美谈。1946年3月周恩来给瞿秋白幼年挚友羊牧之的信中写道：“秋白同志毕生服务人民大众，卒以成仁，耿耿丹衷，举世怀仰。”周恩来同志用“耿耿丹衷，举世怀仰”八字以对先烈瞿秋白光辉品格的赞颂，其实也是周恩来同志毕生革命精神的真实写照，也正是周恩来与瞿秋白两人间崇高革命情谊的精辟概括。

瞿秋白与周恩来之间的革命友谊，最先表现在大革命时代，为我党争取革命领导权，对待蒋介石的态度上，志同道合，彼此呼应，通力协作。

1920年6月，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指出：无产阶级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在中国，李大钊、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邓中夏等人，都是较早率先响应并实行这一指示的中共党员。瞿秋白曾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之中，自然处于革命的领袖地位”。同时，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共产党人起了领导作用。周恩来后来回忆道：这次“代表大会的宣言，是孙中山先生委托鲍罗廷起草，由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的”。周恩来刚自欧洲考察归国，即欣然接受党的派遣，帮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任军校政治部主任。

国共合作促成了我国现代史上第一次革命高潮的到来。促进了工农运动的发展。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举行。在这次会上，周恩来与瞿秋白结下了亲密的友谊。以后，由于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认识的一致，他们的革命友谊与日俱增。会后，周恩来回到广东黄埔军校，参与领导了广东革命军征讨旧军阀，使广东全省成为统一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并且，早在1925年11月，东江平定，广东基本统一时，周恩来就明察秋毫，发现蒋介石已表露出了在军队中排斥共产党人的企图。他特地从汕头前线赶回广州，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苏联顾问鲍罗廷商量。计划给蒋介石以回击，另组国共合作部队。但是，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却专横独断，反对这一计划。1926年春，蒋介石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对蒋介石破坏革命统一战线

这一重大阴谋活动，周恩来对蒋介石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在大义凛然的周恩来面前，蒋介石只得将扣押的人释放。

与周恩来在广东战斗的同时，瞿秋白活跃在上海党中央理论宣传文化教育战线上。他致力于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中国问题，培养革命干部，批判国民党右派分裂统一战线的戴季陶主义，同时为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在广东进行的武装斗争擂鼓助威。1925年9月，瞿秋白在《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中明确指出：“广州革命政府的存在及最近对于陈炯明、杨希閔的胜利，没有工农的赞助，没有C·P（当时常用C·P作为中共和共产党员的代称——笔者注）的出力，决办不到。”这是党中央执委中，较早肯定周恩来等同志在统一广东斗争中的功绩。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和以后继续反叛革命的消息传到上海以后，当时正因肺病住院的瞿秋白，闻讯抱病提前出院，迅急赶到广东，与周恩来等同志商量，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9月，他回到上海，作了《由粤回来的报告》。之后，瞿遵医嘱休息时，还对前来探病的中宣部干部说：“在我党推动下，伟大的北伐战争已经开始了，周恩来、林伯渠、李富春、叶挺、粟裕等一大批共产党卓越的军事干部，目前都在北伐军里担任主要骨干。看来经过几次大战后，革命形势将会突变。”他坚定地说：要宣传北伐的意义和每一战役的胜利；“要进一步唤起广大工农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拥护我党立场的人士，参加北伐，支持北伐，争取北伐战争的彻底胜利。”这是作为党中央执委对周恩来等同志参加并领导北伐的肯定与支持。

同时，共同的历史使命，使周恩来和瞿秋白经常来往于国民革命中心广州和中共领导中心上海之间，联系研究革命工作，两人互相切磋理论，讨论实际问题，展望革命前景。他俩以及与毛泽东同志之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26年5月至9月，瞿秋白与周恩来，都应邀为毛泽东负责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瞿秋白讲《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周恩来讲《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都深得学员的欢迎。

人们还一直传流着周恩来隆冬赠送瞿秋白以旧皮袍、瞿秋白赞誉周恩来的故事：

“这年（1926）冬天的一个上午，我听说宣传部要随中央迁往武汉的消息去看望秋白。……他一见我就问：‘什么时候就走？’我答以，‘在待命中’。他充满革命的信心，高兴地说：‘不久，我也要去武汉，当前革命形势是好的，就是身体太差了。’他指着身上的皮袍深有感情地说：‘这两天，全亏这件皮袍，这是周恩来去广州时说到南方用不着了，留给我的’。接着他又向我介绍了周恩来同志的一些情况，并称赞他是一位永远不考虑个人安危，永远战斗在第一线，永远体贴和关怀别人的好同志。”

从上面引述的故事看出，周恩来对瞿秋白同志式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而在当时处于中央执委地位的领导成员中，瞿秋白对周恩来的舍己为人民、冲锋进击在前线、千方百计为同志的共产主义风格与高尚品德是感慨良深的。这三个“永远”，也是对周恩来一生的真实素描和精神写照。

周瞿的伟大友谊，特别表现在政治危机时刻的明邃的洞察力与处事的勇敢精神。1927年4月，瞿秋白以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身份，与新任《汉口国民日报》总主笔沈雁冰讨论编报方针时，就以“揭露蒋介石的反共和分裂阴谋”作为宣传的首要之点。瞿秋白还说：“此人（指蒋介石）十分阴险，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又说：“他已经掌握了军队，又有京、沪、杭的地

盘，完全是个新军阀，为日后一大隐患。”同年4月中，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兼江浙军委书记的周恩来，掌握到确切情报：蒋介石在九江、安庆、宁波、杭州、南京、上海等地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农群众，制造一连串的反革命血案。无产阶级与人民群众的革命处于危机之中，周恩来就领衔火速发出了给中共中央的意见书，《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瞿秋白则于五月中、下旬，撰写论文《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和在太平洋劳动会议（武汉召开）上讲话，振臂疾呼：“打倒蒋介石和一切反革命！”

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与周恩来在党中央工作期间紧密合作，并肩战斗，共同总结经验教训，寻求正确道路，有效地开展领导工作，为消除右倾机会主义造成的恶果，为发现和纠正“左”倾盲动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建立了不朽功勋。

瞿秋白主持召开的“八七”会议，成为中共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纠正与结束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会议选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等人为正式委员，周恩来等为候补委员。并决定由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主持中央工作。瞿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周恩来负责军事部。11月又决定吸收周恩来、罗亦农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然而，“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有认识应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恰当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因而在组织上开始了党内的过火斗争，导致了“左”倾错误。

1928年2月，共产国际讨论了中国问题，作出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指示。瞿秋白与周恩来一道出席并主持了这次会议。

他俩在莫斯科一道正确地处理了一桩诬陷案件。原来，1927年冬，俞秀松、董亦湘等同志在苏联受到王明宗派主义集团的诬陷，被打成莫须有的“江浙同乡会主要成员”。当时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负责人向忠发听了片面之词，宣布“江浙同乡会是一个反革命组织，不坦白就枪毙”。1928年春，瞿秋白、周恩来来到莫斯科后，坚持实事求是，经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以及瞿秋白、周恩来亲自参加的中共代表团三方联合审查，否定了这个“同乡会”的存在，为一批蒙诬的同志伸了不白之冤。

1928年6月18日到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大会。瞿秋白除致开会词外，并向大会提交了书面报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作了《政治报告》和《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与军事问题的报告。大会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瞿秋白虚心听取大会的批评，并在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毫不推诿过失。关于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一直发展下去没有间断地达到社会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这个错误理论，本来那时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那兹提出来的。但是瞿秋白却未推诿，而是主动承担责任，且写进了《政治决议案》。周恩来后来回忆：“‘六大’决议是瞿秋白同志起草的，米夫、布哈林都修改过，拿回来后秋白同志又改过。”在自己执笔起草的会议决议案中勇于批评自己的失误，这种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的风格，在我党历史上是从瞿秋白开始的。在大会后的六届一中全会上，瞿秋白、向忠发、周恩来等七人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向忠发任总书记。以后瞿秋白留在共产国际工作，任中共代表团团长。

在六大以后一段时间内，由于贯彻执行了六大决议，党的工作是有成绩

的。但是，在李立三实际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党内还潜伏着的“左”倾思想，在1930年5月，蒋、冯、阎战争爆发后又发展起来，形成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1930年夏。瞿秋白经西欧回国。9月24日—28日，瞿秋白、周恩来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会上，向忠发作了《工作报告》，周恩来作《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李立三作自我批评的发言，瞿秋白作《政治讨论的结论》。会议通过了瞿秋白起草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在会上，瞿秋白正确地提出了“‘左’倾并不比右倾好些”的科学论断。会议批评了李立三对当时革命形势的错误分析。瞿秋白、周恩来等人提出和采取一系列措施，制止了立三“左”倾冒险行动，即“停止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因而它就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1930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筹备会在上海举行。瞿秋白、周恩来等参加了会议。

从“八七”会议到1930年冬，瞿秋白与周恩来等同志的协调工作，为纠正右倾机会主义造成的恶果，制止“左”倾盲动主义，推进中国革命发展，起了中流砥柱作用；为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贡献。这些历史功绩，为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进程所肯定。也可以从敌人方面得到反证：1931年9月，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向“国民政府”发出密令，以当时最高悬赏金额两万元，通缉瞿秋白、周恩来，亦可见瞿周配合战斗效果之一斑。

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在米夫为代表的共产国际支持下，瞿秋白、周恩来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挤打击。瞿秋白被排斥出中央政治局，将近3年没有分配工作。四中全会后周恩来到了中央苏区。瞿秋白也于1934年2月到达江西瑞金。

周恩来和瞿秋白都是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团成员。当时正是国民党反动政府以五十万兵力分四路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周恩来在 frontline 指挥“反围剿”战争。瞿秋白在瑞金主管文教和“红色中华”编务等工作。当时瞿秋白患了肺病，邓颖超从几里路外，亲自送来了面粉、白糖。这在当时是“最好的营养品了”。而当时，邓颖超也由于病痛缠身而行动艰难。这就更显出了周恩来、邓颖超伉俪对瞿秋白的关怀。

瞿秋白于1935年6月18日英勇就义于福建长汀后，周恩来对瞿秋白的壮烈牺牲，一直深切怀念和高度评价。对他的遗属安慰劝勉。1939年秋，周恩来去苏联治疗臂伤，在莫斯科见到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见她总是抑制不住悲痛，经常哭泣，就劝她“要养好身体，继承秋白遗志，好好为党工作”。并且肯定：“秋白是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忍辱负重，任劳任怨，无私无畏，忘我工作，英勇献身。”“这种崇高精神，是永远值得党和人民纪念的，也值得我好好学习。”他要杨之华坚信：“对党内的大是大非问题，党总是要实事求是地作出澄清的。”这些肺腑之言，使杨之华得到莫大的宽慰与鞭策。后来，杨之华等奉命回延安工作，途经新疆，被反动派下狱。1946年，党中央把他们从狱中救出来，一到延安，周恩来就来看望安慰杨之华，并告诉她：“党中央已经给秋白同志作了很好的结论（指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关瞿秋白的结论），你好好看看，你就可以放心了，不要再哭了，保重身体，好为党工作。”

1955年6月18日，秋白殉难二十周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秋白遗骨安葬仪式。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主祭。周恩来亲自抬着瞿秋白的骨盒，放进墓穴，瞿秋白同志的英灵得以安息。

* * *

从20年代到30年代，周恩来与瞿秋白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共产国际活动中所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情谊，是神圣的、高尚的。它将永远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子孙后代所传颂发扬。注《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北京版

(王豪新)

周恩来与陈毅

陈毅（1901—1972年），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因参加留法学生爱国运动被驱逐回国。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军军委书记。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新四军军长、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建国后，任上海市市长、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等职。

——编者

1966年6月1日。

夜幕降临了，喧闹的都市恢复了宁静。夏日的繁星倒映在中南海平静的水面上，使整个宇宙显得更加神秘、深远。在外交部劳顿了一整天的陈毅，打开收音机，中央台的新闻节目正在广播。以大将风度誉满全军的陈毅，仅听两句，竟象突然遭到雷击，朝着快步进来的杜秘书问道：“中央台在广播北大的大字报，怎么回事？”

秘书茫然地摇摇头：“办公厅没有通知啊！”

“我找总理去！”陈毅不等秘书叫车，“噌噌噌”，几步走出院门。

陈毅怎么能不震惊、气恼呢！5天前，聂元梓等人“炮轰”北京大学党委的大字报贴出后，立即引起北大师生的强烈不满。当天晚上，根据政治局的决定，周恩来派人到北大，重申中央关于文化革命运动中贴大字报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规定，严肃批评了聂元梓等人，学校局势才得以稳定。今晚突然将这张大字报撒向全国，难道希望在全国引起大乱？！

陈毅是周恩来家的常客，他向警卫点点头，径直走进总理办公室，急不可耐地问道：

“总理，政治局开会了？”

“没有。”周总理招呼陈毅坐下。

“那是撞鬼了！中央台为什么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还说什么‘革命’的大字报？把全国人民思想都搞乱了，都起来反对各级党的领导，究竟革谁的命？！中央台能负这个责任吗？！”陈毅越说越气，一巴掌拍在沙发扶手上。

“你别发火嘛！”周恩来口气平静地说。“我也是刚才知道。十分钟前，康生同志来电话，毛主席赞成这张大字报，并决定今晚由中央台向全国播出。”

“哦，毛主席同意的？！”陈毅惊讶地反问，他见周恩来缓缓点头，竟一时语塞。陈毅端起茶杯，咕嘟咕嘟地喝着，大半杯茶水下肚，却没品出滋味。他搁下茶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伸手向周恩来要支烟，大口大口吸着。两人默默坐在乳白色烟雾中，相对无言。

经毛泽东批准，中央派工作组加强各部委党的领导。

中央文革小组却支持造反派反对工作组。

陈毅不客气，给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挂了电话：外交部的运动，中央是叫我陈毅负责的，请你不要插手！他事后毫不隐讳地对周恩来说：我看总是有人躲在后面，煽动娃娃们冲锋！真的弄到辱党辱国，对不起，老子要开刀的！

周恩来深沉的目光里分明流露出担忧，他以商量的口吻说道：陈总，如

果身体可以，我想请你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访问。

“为什么？”陈毅惊异地问：“不是决定你去？”

周恩来有无法直言的缘由。就是几个小时前，周恩来把卫皮区司令员傅崇碧请来交待任务：我很快要出国访问。中央决定，C月下旬召开的亚非作家学会会议由陈老总主持。这是一次有国际影响的会议，警卫工作一定要搞好，不能有丝毫差错。

傅崇碧严肃地点点头，掏出笔记本和总理一起研究具体方案。

正在一旁理头发的江青恶声恶气地大声说道，“陈毅这个人，过去是反毛主席的，他这个人很骄傲！”

康生呷口茶水，接过话茬，火上浇油：“是哦，骄傲得很呐，骄傲得不可一世！”

江青巡视着傅崇碧，气势汹汹地说：“你不要看他是个老总，一有机会，他还要东山再起，还要反毛主席的！他是利用亚非紧急会议提高自己的威信！”

周恩夹脸色凝重，仿佛没听见江青、康生的诅咒，语气严肃恳切地说：崇碧同志，这次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非常重要。中央把主持会议的任务交给陈老总，你一定要保护好会议。派一个团保护好会场。如果有人冲，失扣起来。

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认识陈毅，了解他的才能。更熟悉他仗义执言、无所畏惧的性格，面对国内复杂的斗争局势，他有心让陈毅回避一下。

陈毅不肯，认为出访还是周恩来合适。周恩来用力握着陈毅的手，深情地摇了摇，说：“好吧，出访还是我去”。顿了顿，又接着说：“陈总，文化大革命第一次搞，问题确实错综复杂，我想再提醒你一下：遇事不要急躁，谨慎行事。更不要不分场合地发‘政治脾气’，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保卫措施，你找傅崇碧同志落实一下，既要有防备，又要以宣传教育为主……”

陈毅一点头应承着。

娴静的月亮象技艺高超的摄影师，悄悄地按下快门，把周恩来与陈毅的身影，留在祖国美丽可爱、却又是多灾多难的土地上。

“文化大革命”起来后，党中央对“文化革命”的集体领导取消了，中央派出的工作组均变为执行“资反路线”的代理人受到造反派围攻和批判。

陈毅已经隐约感觉到，中国革命的航船偏入一条礁牙狰狞、风涛险恶的危险航道！他无力纠正航向，但是，他要坚守自己的指挥岗位，保持稳定。他在外交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旗帜鲜明地说过：

“只要中央一天不撤掉我外交部长的职务，我就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并企图影响这个运动！”

外交系统批判工作组大会，陈毅都去参加。没有“我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等最时髦、最能激起狂热掌声的语言，也没有吞吞吐吐，模棱两可、永远是“真理”的废话，他总是旗帜鲜明地提出：派工作组的错误是当时局面造成的；我是支持工作组的；工作组的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硬是要和稀泥！

当造反派狂妄地直呼其名问道：陈毅，你到底跟不跟毛主席走？

“我决定跟毛主席走！”陈毅一板一眼，毫不含糊：“但是，我不敢保证将来就不反对毛主席的一些意见！”

陈毅的举动，当然被中央文革小组视为“文化大革命”的巨大障碍。有人开始操纵造反派集中火力，向陈毅发起了攻击和围剿。

一个强烈的念头牢牢攫住陈毅的心，他想向毛泽东谈一谈。

1966年8月31日，天安门广场又一次成了人海旗林。

天安门城楼上，身穿军装的毛泽东微笑着与陈毅握手，一同走进休息室，关切询问情况后说：我保你！

“主席，我要争取自己过关，我还有个想法。”

“什么想法？”毛泽东很感兴趣地问。

“主席，现在年轻娃娃没有参加过路线斗争，也不懂什么是路线斗争，我想，应该给他们讲讲历史，用我自己的经验教训，教会娃娃们搞路线斗争，你看行不行？”

“好嘛！”毛泽东欣然应允。

自从10月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特别是11月2日，《红旗》杂志第十四期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一文发表后，凡是向陈毅提出邀请的群众集会，他都爽快地答应，并且只要参加，必定讲话。

这天，周恩来把陈毅请到自己的住所西花厅，明确地交待任务：“从现在开始，你不要讲话。”

“什么？什么？”陈毅惊讶地瞪大眼睛，指着自己的鼻子问道：“叫我不要讲话？！”

周恩来肯定地点点头。

陈毅愕然。“文革”以来，有不少同志劝他不要讲话，少惹麻烦。总理没有劝过。况且，就是两三天前，周总理还请他出面讲话嘛！

原来，各地涌到北京“上访”的工人急剧增多。如果听任停产串联的势头发展，后果不只是运输紧张、社会秩序混乱，而是国民经济的停滞、倒退乃至崩溃！周恩来连夜召集会议决定：召开一次号召来京串联的工人迅速返回本地抓革命促生产大会。海报已经贴出去了，数万张入场券也下发了，中央文革坚决反对开会，罪名是“以生产压革命”。明摆着，“文革小组”的决定不容抗拒。周恩来提出：“会议照开，这么多工人集合起来也不容易，就请陈老总给工人同志们作个形势报告吧！”

“可以，我讲！”陈毅满口答应。陈毅非常清楚周恩来的苦衷。政治局常委的身份，使他始终处于斗争漩涡的中心：他必须执行主席的部署，跟上“文革小组”的安排，不与他们硬顶，因为“文革小组”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中央书记处；他又必须牢牢抓紧工农业生产等实际工作，尽量减少运动对生产的冲击和影响。因为他是总理，他肩上担着八亿人民的衣食住行。他必须正视现实，光靠革命口号，养不活几亿人民！陈毅日益强烈地感受到：周恩来正以其诚恳与智慧，竭尽全力寻找“向中央”和“向人民”负责的一致性。作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将全力辅佐！

在这次会上，陈毅从国际形势讲到工人阶级的责任，讲到“当家人”要坚持狠狠抓生产，狠狠抓革命。这种发言，当然又遭到造反派的攻击……

周恩来话语充满忧虑，林彪批判了谷牧同志起草的工交系统文革十条规定，说是典型的以生产压革命。看样子，余秋里、谷牧同志今后都很难出面讲话了。这么大的国家，千头万绪的工作，我总不能没有几个帮手嘛！一年之际在于春，明年初部长们被围斗不能工作，全年的工作就要受影响了。周恩来见陈毅点头赞同，话头一转：陈总，我想让你带个头，你看怎么样，

“叫我带头向造反派检讨？！”陈毅顿时明白了周恩来的意思：“我有什么错误？！要学生们顾大局，这话错了？要工人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坚持

业余闹革命，这话错吗？！只要我说的没有错，我就坚持！我就是不低头，不检讨！？”

“陈总！”周恩来双目注视着陈毅，几乎是恳求了：“就忍了这一次吧！”

“不！”陈毅断然回绝：“士可杀，不可辱！大不了一把刀子。”

接见外宾的时间到了。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陈毅说：“陈总呀。我希望你再想一想。你是外交部长，外事工作一天都不能中断，你要总是被包围、被批判。工作让谁抓？我要管的方面太多，我一个人顶不下整个天啊！”

陈毅注意到一向精力充沛的周恩来，今天明显露出疲倦，憔悴的神色，他不愿再惹总理烦恼，有些含糊其辞地说：

“好！我回去再想想吧，想通了，我来找你。”

几天过去了。这天下午，中央召开例行碰头会议，研究有关运动的问题。

陈毅对这类会议不感兴趣，每次开会，总是“文革小组”的几位“左派”包场，无限上纲的攻击性言辞，高八度的骂街腔调，令人腻烦。身边叶剑英递给他一张信笺，努努嘴，没吭声。陈毅一看，是首词：

串连炮轰何时了，

罢官知多少？

沙场赫赫旧威风，

顶住小将轮番几回冲！

陈毅提笔批了四个龙飞凤舞的大字：绝妙好词！站在最后的感叹号，画得又粗又重，象陈毅伸起的大拇指！突然，他发现叶剑英正震惊、痛楚地凝视着一个方向……陈毅转目追寻过去，顷刻，他也象冷不丁掉进冰水中，坐在斜对面的周恩来，用右手支撑着前额，两只眼睛不断眨动着，眨动着，可是终于抵抗不住，慢慢地合拢了。

“周总理在打瞌睡！”陈毅简直不敢相信！当然，这只是几秒钟的情景。此时，周恩来已站起身，缓步走到墙边，向痰盂里倒掉少许冷茶，又提起水瓶，往杯里添些热水。几步的活动，他已恢复了精力，坐回座位，继续听取陈伯达喋喋不休的质问和声讨。

陈毅的心再也无法保持平衡了！他紧紧抵住双唇，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记得有一次在非洲某国访问，长途的飞行，紧张的会谈，再加上炎热干燥的沙漠气候，陈毅直感到困倦不堪，在从机场开往宾馆的汽车里睡着了，周总理右肩托着他，左手不断向路边欢迎的群众挥动致意，精神饱满极了，直到进市区才唤醒陈毅……就从那一次，周恩来建议陈毅戴上副墨镜，凡由他出面主谈时，陈毅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会。但有一个条件：不准打呼噜……

可今天，周恩来竟也打瞌睡了！他实在太累了。

会散了，叶剑英在门口放慢脚步，等陈毅出来，上了陈毅的车。车开动了，两个却心事凝重，沉默无言。分手前，叶剑英握住陈毅的手晃了晃，说：“陈总，我们要分担责任，可不能眼看着周总理累垮了！这种形势，没有总理不行呀！”

陈毅凝重地点点头。

周恩来刚进家门，陈毅也推门进来。

“陈总，找我有事？”周恩来见陈毅神情有些异样，亲切地询问道。

“总理，我想通了。我从今天开始，不再放炮。我检讨，一定深刻检讨，争取早日得到群众谅解和信任，把握好外交部的工作。”

周恩来跨前一步，紧握着陈毅的手，激动而又深沉地说：“好！你就带

个头，以大事为重”。他揽着陈毅的肩，慢慢踱着步，叮咛道：“检讨不要太长，写好拿给我看看，……”

陈毅告辞时，周恩来留他吃饭。

“不了”。陈毅不忍心再劳累总理，他摇摇头：“张茜还在家等着呢。”走至门边，陈毅又站住了。他转过脸，望着周恩来说：“总理，你要多保重身体嘞！不只是为自己、为大姐，是为整个党，整个国家！”

陈毅喉头一阵发紧，他急转身走出门，让两颗晶亮的泪珠，躲过周恩来敏锐的眼睛，悄悄落在自己的前襟！

外交部天天能与陈毅打交道的造反派头头们首先发现，陈毅近来沉默了。凡向他请示，他一反经常果断干脆的作风，总回答一句话：“等我请示周总理以后再定！”

“陈毅肯定挨中央批评了！”“陈毅只得老老实实写检查了！”外交部造反派的窃窃私语，迅速从各种渠道传向社会，“外院”造反派批判陈毅的调子直线上升，竟然绘制了近百张批判陈毅的漫画，放在学校里展出已不过瘾，一纸“最最强烈要求”递至周恩来办公桌上：立即调拨一节火车，供“革命小将”专用。他们要把批判陈毅的画展运往全国各地展出。同时还强烈要求：陈毅必须滚到外院革命造反派面前低头认罪。

周恩来看到这份名曰请求、实为通牒的信，果断地向秘书布置：“请你安排一个时间，我接见他们。”

秘书迅速翻了翻手中笔记本，为难地说：“总理，今天实在安排不下，一昼夜只有24小时，现在已经排满16个小时了……”

“不行，只能安排在今天，夜长梦多，不能让他们这样胡闹下去！你想法插空，总之，一定要在今天。”

最后，“空”是“插”到了，当然，又插掉了总理三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在外语学院档案室里，至今保存着周恩来总理接见外院造反派的谈话记录，从1966年至1973年8年间共接见二十多次，其中1966年12月底至1967年1月底，短短30天里，周总理接见外院造反派五次之多，累计二十多小时。有一半的时间，是为了说服造反派正确看待陈毅。当时，六位副总理都遭炮轰，为保护每一位战友，周恩来经受了造反派多少次轮番围攻，强咽过多么大的屈辱，这是一般人不能想象的。

周恩来每次接见造反派，陈毅并不出席。接见时的情况，周恩来也从未向他谈起。不过，周恩来每次接见讲话的内容，陈毅却能从造反派的小报上看到。有时候，读着读着，陈毅禁不住痛楚地闭上眼睛。他从字里行间不难想见造反派横蛮无理，咄咄逼人；周恩来苦口婆心、忍气相劝的场面。他常仰天长叹：无论从公从私，周恩来都是我的兄长，不是周总理用自己的身体遮挡着明枪暗箭，恐怕十个陈毅也早被撂倒了。

1967年1月24日下午4时，人民大会堂里座无虚席，四周边厅里也坐满了收听会场实况广播的学生。

陈毅念着自己的检查——一份经过周恩来亲自修改定稿的检查，语调沉重，态度虔诚。检查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结束。周恩来最后总结：我可以比较放心外事上的事，让陈毅同志多出面，我把力量转到别的口子上去。谢谢大家支持。会场掌声如雷，为总理对外事口的信任，也为陈毅的检查过关。

因为这是第一位副总理被“解放”，周恩来显得兴致勃勃。他拉上陈毅，依次走向大会堂四周各厅，与学生们一一见面。

陈毅军装整齐，胸挺得笔直，步子稳健有力。如果留心观察，会发现他的微笑是严肃的，目光是凝重的，他不象一位得胜还朝的将军，倒象是卸去沉重的枷锁，准备投身更严酷斗争的勇士。

1967年2月13日和16日下午3点，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室举行的中央碰头会议上围绕：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稳定军队，对老干部应不应该都打倒的问题，以四位副总理和四位元帅为代表，与林彪、“四人帮”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这就是震撼全国的所谓大闹怀仁堂的“二月逆流”。

会议当晚，周恩来没去“游泳池”向毛泽东汇报碰头会上的争论情况——党内畅所欲言本来很正常，他是政治局常委，他一向给毛泽东汇报情况时，总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解决矛盾的办法。

然而，恶人先告状，历来如此。2月16日当晚，由江青安排，张春桥、工力和姚文元先后走进了毛泽东的书房。他们一番摇唇鼓舌，诬蔑栽赃，顿时激起了毛泽东的雷霆震怒。周恩来力图缓解事态的愿望无法实现了。

于是，政治嗅觉异常敏锐的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立即气势汹汹、杀气腾腾，向这批被他们视为喉中鲠、肉中刺的开国元勋，发起了欲置他们于死地的猖狂围攻。

陈毅被诬蔑为“三个副总理、三个军委副主席组成的一文一武政变中心的穿针引线的人”，“是二月逆流的黑统帅，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在中央生活会上批斗还不足打倒搞臭，于是，中央文革小组无视周恩来宣布的纪律，将中央碰头会上陈毅等老同志的发言内容大加歪曲、篡改，并冠以“二月逆流”的巨型高帽，通过造反派，向社会迅速扩散开去。

有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的极左思潮被煽动了、助长了，他们集中火力，更加肆无忌惮地攻击陈毅，并且不择手段地向周恩来施加压力，制造种种事端，企图把陈毅从周恩来严密保护下抢到自己手中，听凭造反派从精神上乃至肉体上批倒批臭。

造反派每回批斗陈毅，周恩来都要亲自参加，其实等于陪斗。偶尔总理外事活动无法分身，也要委托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出席，并且派自己的秘书、卫士长从头至尾参加会议，一为保护陈毅安全，二为自己能随时掌握真实情况，以防万一。

吃罢晚饭，陈毅接完周恩来亲自打来的电话，招呼备车，大黑后出发。

“又要上哪儿？”张茜不安地问道。

“噢，总理让我今晚住进人民大会堂，那里安静，能好好睡一觉，省得明天挨批判时打瞌睡。”陈毅口吻轻松，说完还笑了笑。

张茜望着陈毅明显消瘦的脸庞，凄楚地摇摇头。短短二十几天，陈毅已被大会、小会批判六七次。陈毅从没向她细说被批斗的详情。可是，如果没有特殊威胁，总理是不会让他住进人民大会堂的……想到这里，泪水顺着她苍白的面颊，滚落下来。

“哎，你不要担心嘛！”陈毅扶着妻子的肩膀安慰道：“总理考虑问题一向仔细，他担心造反派明天再截我的汽车，就采取这预防万一的措施，你不必紧张嘛！北京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嘛！”

在人民大会堂边厅休息室里，陈毅早早熄灯上了床，为了明天精力充沛，他强迫自己闭上了双眼。没有高音喇叭的吼叫，心思再重也抗不住多日的困倦和疲劳，陈毅终于睡着了。

在同一座建筑的另一个边厅里，周恩来正在接见下午在外交部闹事的造

反派代表。造反派根本不听周恩来的批评，从半夜一直纠缠到第二天凌晨。

周恩来已经连续工作 18 小时，心脏又隐隐作痛。他连服了两次药，仍不见好转。保健医生焦灼不安，写纸条递给被造反派尊为“革命干部”的姚登山，他竟置之不理，听任造反派胡闹下去。

周恩来生气地站起来，严厉地批评：“冲外交部，不管怎么样，按中央的规定是不对的！”造反派立即毫无理性地叫嚷，高声打断了周恩来的话。

“你们是不是跟我开辩论会？！”周恩来义正辞严地批评造反派，更是一语道破幕后怂恿、策划者的险恶用心，“你们整我就是了！你们采取轮流战术，从 12 点到现在，18 个钟头了，我还没睡觉，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

保健医生忍无可忍，冲到姚登山面前愤愤地说：“如果总理今天发生意外，你必须承担一切责任！”说罢，搀起周恩来离开会场。造反派依旧在叫嚷：

“明天拦住陈毅汽车！”

“我们还要再次冲击会场！”

走到门边的周恩来陡然回转身来，两眼燃烧着愤怒的烈焰，严正警告：“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今天要冲会场，我一定出席，并站在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陈毅在人民大会堂的批斗会场里被滞留了近 20 小时，至繁星满天的午夜，他才乘车回到家中。等候在会客室的卞主任立即戴上听诊器，为陈毅检查。

“卞主任，你怎么来了？”陈毅略觉吃惊：“为什么不去照顾总理？”

“是总理交代我来看看你的。”卞主任解释说，“总理担心您身体吃不消。”

陈毅眼睛热了，他动情地说：“谢谢总理了。听说总理早晨心脏不好，现在怎样？”

“休息一下，稍好些。”卞主任放下听诊器，“总理太累了，他太需要静养一段时间，可是，唉，现在这种作法，我真不能理解……”

今天清晨，卞上任扶周恩来睡上床，吸完一袋氧气，脸上慢慢有些血色，呼吸均匀，脉搏平稳，渐渐进入梦乡。刚睡半小时，悬挂在墙外的高音喇叭，又一齐叫喊起来。卞主任急忙起身关紧北窗，可是无法挡住震耳欲聋的呐喊声。周恩来被惊醒了，他费力地抬起沉重的眼皮，向床边卞主任问道：“我睡多久了？是不是该起床了？不能耽误接见时间……”

“总理，您刚睡了半小时，再睡会吧！”

总理轻轻“哦”了一声，又闭上双眼。不过，眼睑一直在颤动着，隔一会儿，睁眼看看枕边的手表，后来，干脆睁开眼睛，凝视着天花板……

卞志强忍不住恳求道：“总理，我是医生，我不讲话，我就失职。您的心脏再也经不起这种嘈杂环境的折磨，您必须离开这里，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否则……”

“你这个同志怎么这样罗嗦？！”周恩来突然发火了：“我早就说过，就是大炮轰，我也不能离开中南海！只要我住在这里，高音喇叭只能喊，造反派不敢冲。我要一走，造反派冲进来怎么办？中南海里住着的老同志怎么办？这些老同志，我是一定要保的，毛主席也让我保，这是我的责任，这是我的阵地！我能临阵脱逃吗？！”

卞主任低下头，强忍着泪水检讨说：“总理，您别生气，是我说错了……”
寂静片刻，周恩来长长地吁了口气，在卞主任的手背上轻轻拍了几下，说：“卞主任，请你原谅，我在外头受了气，就拿你们出气了，我知道你是好心，是关心我。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卞主任握住周恩来的手，热泪夺眶而出，他真想向周总理大声说：“只要您能心里痛快，只要您身体好，想说您就说吧！”可是，泪水便住了咽喉，他只能点点头……

卞主任为陈毅检查了身体，陈毅亲自把他送到门口，握别时又叮嘱一句：“请转告总理，我一切都好，不要担心，请他自己多保重。”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叶群等叛国投敌，摔死在温都尔汗！

人民大会堂会议厅里，中央召集的老同志座谈会开始了。直肠癌已广泛转移，正进行放射治疗的陈毅坚持从医院赶来，满腔义愤，慷慨激昂，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开会，周恩来提出发言时录音的建议，陈毅完全赞成。他说：“我希望把记录保存下来，作为一种档案，将来写军史党史可以参考。”

三万多字的发言，陈毅又讲了整整一上午，话刚讲完，一股殷红的鲜血从鼻腔里涌了出来。医生将他搀扶上车，送回医院。

为挽救陈毅的生命，保证治疗效果，周恩来亲自批示：将陈毅转到北京日坛医院，又亲笔批准日坛医院给陈毅作了胃肠短路手术。

1972年1月2日深夜，周恩来接到医生报告：陈毅同志现在神志非常清醒，似是回光返照现象。周恩来立即从人民大会堂乘车赶到日坛医院，急步走进陈毅病房，掩门长谈。

周恩来离去一会，陈毅又陷入昏迷……

1972年1月6日深夜11点55分，陈毅永远停止了呼吸。

哭声骤然四起……

朔风凛冽，大地冰封。夜色是这样的黑，这样的浓。忙了整整一天的周恩来，沿着狭窄的楼梯，一级一级走进地下甬道，陈毅的遗体已经移到301医院的太平间。

陈毅静静躺在风口，身上只盖着一层白布床单。

周恩来清瘦的面容凝聚着深沉的悲痛，他恭恭敬敬向陈毅的遗体三鞠躬，礼毕，径直走到陈毅床边，伸手掀起床单的一角，缓缓地摸了摸陈毅的手背，泪水潸然滚落。周恩来重新为陈毅拉平床单，动作轻缓、小心，床单盖好后，又往里掖了掖。

立在旁边的张茜呜咽出声，她握住周恩来伸来的右手，抽泣着说：“周总理，您要多保重身体啊！大姐也为您担心。”

“谢谢。”

周恩来走到门口，又忍不住回过头来，向安卧着的陈毅投去永别的目光，黎明时刻，陈毅的遗体也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不要赶散！”周恩来声音不大，态度果断：“组织他们进去告别一下！”这是回复中组部部长的电话。医院从早到晚聚了数百人，有地方干部，也有军人，都是按上定规格无权参加遗体告别的。

放下电话，望着桌上政治局委员一一圈阅的文件，周恩来沉重地叹息一声。

按照文件上所定的规格：陈毅已不算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的追悼会由

中央军委出面组织。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追悼会，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参加追悼会人数为 500 人。地点八宝山。悼词连头带尾 600 字，简历占去一大半篇幅。

对于悼词，毛泽东圈去了“有功有过”四个字，这对周恩来是一个极大的安慰：现在悼词尽管对陈毅没有作充分的评价，但是肯定了陈毅一生为人民服务的战斗精神。他若在天有灵，是头首肯的。况且悼词张茜已经看了，她亲口对周恩来说：我只要“优秀共产党员”、“忠诚战士”两句话就够了！这是一位熟知丈夫情操的好妻子！

这几天来，宋庆龄副主席来过电话，她坚持出席陈毅的追悼会；西哈努克亲王亲自打印了唁函，并提出参加陈毅追悼会的请求；秘书还接到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挂来的电话，许多民主党派人士要求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周恩来又何尝不愿满足这种真挚情感的最后寄托呢？！可是，政治局定下的规格，他无权改动。

10 日下午 3 点，陈毅的追悼会将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举行了。中午 12 点，周恩来面前的饭菜几乎没动。往日宁静的西花厅里。一直响着周恩来沉重的长时间的踱步声。

中南海，“游泳池”。

毛泽东突然缓缓从床上坐起身：“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游泳池”打来的电话，象严冬刮起一阵春风，驱散了周恩来的满脸阴云，他立即拨通中央办公厅的电话，声音宏亮有力：

“我是周恩来，请马上通知在京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同志追悼会；通知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通知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提出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要求的都能去参加。”

“我是周恩来，请转告西哈努克亲王，如果他愿意，请他出席陈毅外长追悼会，我们将有国家领导人出席。”

周恩来依据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的举动，迅速作出了提高追悼会规格的决定，这既是周恩来真实感情的流露，也是他机敏过人的才智和果断！

搁下电话，周恩来的“大红旗”风驰电掣，迅速超过毛泽东的专车。

待毛泽东走下车时，周恩来已用电话调来了十几只电热炉，调来了报社、电台记者。

毛泽东泪流两行，他握着张茜的手，话语格外缓慢，沉重：“我来悼念陈毅同志，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张茜搀扶着毛泽东走进会场。毛泽东已经穿上那件银灰色的夹大袍，衣袖上缠着一道宽宽的黑纱。

周恩来站在陈毅遗像前致悼词。他读得缓慢、沉重，不足 600 字的悼词，他曾两次哽咽失语，几乎读不下去，这样的感情失控，出现在素有超人毅力和克制力的周恩来身上，实属罕见，陡然增添了会场里悲痛气氛，硬压在心底的呜咽声、抽泣声顿时响成一片。

在鲜红党旗覆盖下的陈毅骨灰盒前，毛泽东深深地三鞠躬。会场里呜咽之声再次形成高潮，是为陈毅，也是为“文革”以来蒙受屈辱的一切同志。

4 年后，1976 年 1 月 18 日，78 岁的周恩来总理也被“文革”和癌症夺去了生命。这一次，高龄病重的毛泽东主席没有出席他的追悼会，为历史留下永久的遗憾。十里长街，百万群众流泪为他送行。周恩来在烈火中含笑化为洁白的晶体，扑向祖国的江河湖海、苍茫大地。

周恩来、陈毅都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永远生活在人民心里。

（铁竹伟）